

唐代政治人物新论

曹印双 著

TANGDAI ZHENGZHI
RENWU XINLUN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引进科研启动金资助

唐代政治人物新论

曹印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代政治人物新论 / 曹双印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224 - 08482 - 5

I. 唐… II. 曹… III. 政治人物 - 研究 - 中国 - 唐代
IV. K827 =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0874 号

唐代政治人物新论

作 者 曹双印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乾兴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7.25 印张

字 数 1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482 - 5

定 价 14.00 元

序

曹印双君毕业离校短短一年时光,就很欣喜地看到他的新著书稿《唐代政治人物新论》出现在我的面前。

熟悉李唐史事者,仅以书名即可知选题的难度。唐代政治史是唐史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一个领域,而政治人物的研究又是唐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方面。略翻此书,其中所涉人物如高祖李渊、太子建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李勣、尉迟敬德、韩愈等等,多是在唐代政治上发挥过巨大影响的一流名人,因此近世以来,为前贤时贤高度关注,有关论著十分浩繁,许多说法已视同定谳。而印双遵从学术研究的规则,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来重新审视这一系列多被人认为没有多少文章好做的大题目老题目。他经过对传统文献记载认真疏理,慎重思考,尤其是采取变换视角的方法,对其时的重大事件作出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或者更加深入地解读。仅举两例可见一斑:如李渊集团与突厥的关系,对唐前期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印双在进一步肯定陈寅恪先生等前辈关于李渊曾称臣于突厥的结论外,又深入论证了提出这一重大外交决策的主导者无疑应当就是李世民,对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鲜明表明了个人的见解;再如太宗李世民征伐辽东,他跳出传统上多限于从军事上着眼的思路,大胆地提出迥异于前人的认识,认为这一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主要出于太宗

对身后政治安排的考虑。全书中类似之处迭见多有。在学术上尊重却不迷信权威,重提甚至重翻旧案,这需要勇气,其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

书中既有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关注,同时也能够看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处士和挽郎是唐代甚少为人留意的两个阶层,印双君通过细致搜集和系统疏理有关史料,大体恢复了这两类人物的历史面目,而不停步于此,又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视域内,进一步探求其时政治生态若干方面,增加了对李唐历史的认识,从中反映出的学术眼界和研究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

近些年来,大批唐人墓志的陆续刊布,为研治唐史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唐墓志日益广泛的利用,确实为唐史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印双君此书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这类史料的关注和积极使用,这也是他能在传统选题中发掘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初唐一大政治势力秦王府集团,史家已颇多关注,对于这一集团的人员构成根据传统史料也已作了相当精细的考订。在前人基础上,印双利用碑志等石刻文献,续有考订且获得可观成绩,增加人数几近于倍,复以此为据,分关陇、山东、江左三大区域,对其仕进状况进行排比,通过李世民用人政策详细考察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合流,仅此一例,已可见他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上,已经具备较高的眼界和较深的功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因此而忽视对传世文献的关注。著名唐史专家、文献学家先师黄永年教授反复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立足诸如正史之类的传世文献,不深入研读两《唐书》、《资治通鉴》、《通典》等基本史料,在唐史领域一味依赖所谓新材料而冀求一鸣惊人,既无可能也极不可取,于寻常材料,从字里行间

见人所不见,是治学者应当追求的境界。遵从师训,这一道理我也经常对学生讲起。很高兴地看到,印双在此书中并没有背离这一要求,诸多见解,仍是认真读书的发现以及主要立足基本文献的所得。

印双的研究心得,是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的前提下,经过个人认真努力的结果。他也是唐史学界的一代新人,求新需要勇气,科学的结论更需要严谨深入地研究,书中的一些看法是否得当,还应由学界来评判。但无论如何,对他认真探索的精神,还是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印双好学深思,执著学术,他的学术生涯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可以预期,他仍会在这条道路上不懈地走下去。印双新著面世之际,身为老师,写下以上的话,希望看到他不断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贾二强

2008 年春初

绪 论

一、研究唐代政治人物的出发点

在古代中国政与治大都是分开使用的,“政”指事情,主要指国家权力、制度和法令。“治”有时指一种行为,有时指一种状态。近代孙中山将政与治结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此后,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概念才日渐普及。在古代西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讲演集《政治学》中表述了政治概念,他认为政治是国家的行为过程。国家行为包括如何行为、为什么行为和应该怎样行为等,即对政治现象作出价值判断。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中叶,政治权力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的主体,如霍布斯的政治权力理论、布丹的主权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等。^①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政治概念理解又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与阶级相联系的,是由经济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的,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作用。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参与国家管理、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

^① 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体系》,《政治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

的形式、任务和内容。^① 韦伯认为政治就是企图获得权力或扩大权力分配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国家内部或在这个国家的集团之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联结“政治”与“文化”概念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② 这是对“政治”概念范畴的扩充。

中国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政治文化是“客观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的积累,包括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③ 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稿》一书中提道:“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他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项和问题。作出这种处理,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④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界定政治文化时指出:第一,“政治文化”相当于英文“political culture”。大致指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风格。

① 陈荷夫:《再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体系》,《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陈荷夫:《三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体系》,《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1993年,政治卷“政治文化”条。

④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23页。

第二,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又相关的领域。^①

我们可以从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政治史研究中进一步提炼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要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后续的相关论文^②中涉及的政治文化研究要素有:政治集团、政治人物、阶级、政治革命、党派分野、外族盛衰、外患与内政关系、政治与宗教、政治与社会风俗文化、政治制度等。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谈到的政治文化要素有:皇权、官僚集团、君权与相权关系、党争、理学家、士阶层、儒学、精神秩序等。

黄永年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③一书中反映的政治文化要素有:区域政治、政治集团、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中枢政局、种族政治、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政治革新等。

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④政治卷部分,主要展现了以下政治文化要素:政治事件、政治集团、政治人物、帝制、官制、兵制、法制、礼制、教育、内地与周边民族、中外关系等。如果按照宽泛的政治文化概念来说,该书社会卷中的社会阶层、家族宗族、民间信仰,经济卷的赋役、财政,文化卷的儒释道相关政治研究,都可以纳入政治文化研究范畴。

综合上述对政治、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要素的梳理分析,政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5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③ 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

④ 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治文化以国家为主体,政治集团、阶层、个体人物、宗族、民族是国家范畴下的具体实践者,这些实践者的特性、作为及伴随其实践生成影响深远的文化信息符号的内涵都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在政治文化研究兴起背景下,对政治实践主体的关注也是学术入流的关键,这也是本书研究唐代政治人物的出发点。

二、围绕唐代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① 政治文化是最能展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领域。政治文化传承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前进的思想资源储备库、加油站。林国华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对比中国政治文化继承时发现:“古老先民的自然视野中可能隐藏着高贵的政治智慧似乎一点一点被忘却了。”^②政治文化中蕴涵的政治智慧与技艺是个人、民族、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正如阿维罗伊所说:“人在此世的生活不能没有政治技艺,而在彼世的生活方才少不了沉思的德性。”^③因为人类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与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深处,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了永恒的挑战。在人法与神法编织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就是政治家的技艺与使命。而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工作者的作用就在于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梳和研究中延续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能够抵制乃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② 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246 页。

③ 转引自林国华:《历史:没有灵魂的书写》,《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至颠覆自己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① 翻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政治文化典籍,我们可以感受到史家们为一国文明理出秩序的良苦用心及为万民立法的执著精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史学传统出发,致力于从种族文化角度探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后续的相关论文是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在他构建的唐代政治文化研究体系里包含许多政治文化要素,除了他界定的阶级概念以文化为标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标准外,他的政治文化研究实践基本涵盖了中西方传统政治及政治文化概念。他承继了二十四史以政治史为主体的传统,并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内涵,扬弃了中国帝王将相史的研究框架,也扬弃了司马光《资治通鉴》^②帝王教科书的价值取向。他以政治文化要素为枢纽,以大文化背景为依托,侧重勾勒了中国中古的政治文化发展轨迹,旨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增强华夏民族的自信心,也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提供借鉴的思路,这也是他未能完成的《中国历史教训》^③一书的心声。

今天,时代的新显学以科学技术文化为其主要表现形态,人文科学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八十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也迅速增加,精细化的人文学术

① 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5—246页。

②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③ “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表面上似乎强化了人文科学研究,但现实却显现出人文科学作用日益弱化的态势。这也许和五十年来脱离“经史”传统学术精神的夸饰文学和跟风史学有一定关系,不是“经世致用”、“文以载道”之学的必然命运。而中国文化传统中习惯于经史相济的族群习性,也就是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基已经内化到族群遗传基因里,族群的德性欲望又促使被放逐的“经史”的复兴,在今天语境下就是人文科学的兴起。而人文科学中包含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又以贯穿其间的政治因素为联系纽带。今天,哲学领域有政治哲学的复兴,历史领域有政治制度及相关文化的复兴,文学艺术领域政治人物题材的影视剧本成为艺术界及大众关注的热点。世界史研究学者刘军在《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沉浮》^①一文中介绍了西方政治史学的复兴,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也有着广阔的背景。

《二十世纪唐研究》显示了近二十多年来唐史研究有三大热潮:其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经济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潮;其二,伴随国家经济的发展,各项文化事业推进,社会风俗文化及信仰研究又成为第二轮热潮;其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各项文化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邓小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归根结底是政治改革。唐朝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从某种层面上可以揭示中国政治文化的诸多特质,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元素的递变规律,是政治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之一。

^① 刘军:《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沉浮》,《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2期。

三、唐代政治人物研究的方法

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讲究方法。从事政治人物研究,首先要相信有普遍历史观念存在,承认历史是人类合目的、合规律的统一。先哲理解历史的观念是我们前进的基石,如:孔子以中庸思想理解历史实践;马克思以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事物;康德承认人类有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①即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以此来洞察社会的演进轨迹等等,这些是研究人文领域问题的普遍规律。而在人文领域的不同子领域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表现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注疏法,这种方法主要以经学材料为中心,以经典的原文为根本,根据历代学者研究脉络走向为前进依托,代表作《十三经注疏》^②;其二,长编考异法,这种方法主要以史学材料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对史料分类排序,在排比中判定材料真伪,代表作《资治通鉴》。这两种方法发展到清代至鼎盛,相通为考据一途。因此今天说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主要指考据法。西方的传统学术研究,主要是演绎法与归纳法。表现在西方哲学领域,后代哲学家在前代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更新形成自己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如马克思哲学就扬弃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③,海德格尔哲学扬

①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第1版,第3页。

②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③ 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创新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黄美来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学生,他在胡塞尔《现象学》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弃胡塞尔哲学,他们注重创新,而我们的经学家注重护根。在史学领域,他们的政治史学逐渐走向政治哲学^①,而我们的史学从《史记》^②逐渐形成的传记体为主的材料史学发展到近现代仍然很有势力,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就是倡导材料史学的代表^③。西方传统学术研究的两种方法发展到今天,其抽象思辨水平越来越高。

近现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受西方冲击后已发生变化,

① 在近代,历史书写的古典魅力都被政治哲学家的作品继承了。近代经典的政治哲学家无不精通古史。在近代,一定程度上,政治哲学就是历史学,历史学就是政治哲学。源初意义是“探究”(hitoreo)的希腊古词“历史”(historia)在现代政治哲学经典书写中得到完整的表达: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的探究,而政治是藏在历史中的。下面这个名单可以代表这个传统的部分作家及其大致的历史思考范围:博丹(万民史)、利普修斯(罗马)、皮科洛米尼(罗马)、霍特曼(法兰克史)、伯卡里尼(塔西佗)、休谟(英国史)、培根(亨利七世)、霍布斯(希腊、罗马、圣经史)、斯宾诺莎(旧约史)、贵恰尔蒂尼(意大利史、佛罗伦萨史)、布鲁尼(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希腊、罗马、佛罗伦萨史)、麦考莱(罗马、英国史)、柏林布鲁克(历史方法)、波叙埃(旧约政治史)、伏尔泰(文明史、路易十四时代)、哈灵顿(罗马、威尼斯、英国史)、梅斯特(法国史论)、柏克(法国革命史)、弥尔顿(俄国史)、孟德斯鸠(罗马)、卢梭(罗马)、维柯(希腊、罗马)等等。(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241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③ 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另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一方面继承本民族优秀考据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学术的抽象思辨,力图将二者扭结混融为一。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现代史学奠基人在这方面为我们已经开辟了道路,他们相通于在史料中寻求规律,在规律中把握历史脉搏。

陈寅恪指出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参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①这种方法不但囊括考据学的精髓,也嫁接了西方哲学观念的治学方法,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就是明证。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不仅包括了上述方法,而且创新了种族文化分析法,其内容包含了今天一些学者应用的文化要素分析法。在陈先生的论著里,文化要素有中外之分、地域之分、民族之分、制度之分、信仰之分、语言之分、种族之分、集团之分、文体文本之分等等,每种文化要素的因子及其再生因子包罗甚众。他是力图全面考察重大文化现象的文化因子分合,探究其间的递变规律。目前国内影响比较大的人文学者也都比较注重中西近代两种学术方法融合,比如阎步克、朱学勤、罗志田、葛兆光、尤西林等。^②当然有些学者有急功近利倾向,他们为了迅速在学界崛起,更多侧重用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8页。

② 代表作: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版),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材料,学风有些浮躁,这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笔者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理论,发现其探讨中古历史的理论方法内核是:以胡汉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以佛教、道教、儒家经学三大思想文化为背景依托,以中古政治文化为主轴,选取政治文化各种要素纠结的若干关键问题,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包括人物、集团、事件、文本为切入点,围绕关键点文化要素格局构成,探究文化要素因子分合理路,追寻不同政治文化因子的融合过程,揭示政治文化的递变规律。此理论方法具体操作:首先,在广泛阅读资料基础上,对理解材料形成的问题格局域及关键元素有直觉把握;其次,从问题关键元素出发,观察它与格局中的其他元素的牵动线索,在关键元素与其他元素互动中完成对格局整体的把握;再次,伴随关键元素的动态变化,描绘格局的变动脉络。此理论执行过程中也有难度:其一,将相关问题的原始资料要尽可能多地占有,才能形成比较接近真相的整体直觉;其二,对格局中关键元素提炼程度,直接制约着问题价值的大小。这种方法弱点在于阅读中形成的直觉往往受个人阅读及生活阅历等个性因素制约,有偏颇倾向。这种方法好处在于可以提升化繁为简的智慧,便于将悟得的简约原理应用于实践,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经世致用旨趣相吻合。这也是本书选取唐代政治人物研究个体旨趣。

四、研究唐代政治人物及相关政治主题新论要点

通过与个体关联的秦府集团与区域文化、处士阶层与精神信仰、挽郎阶层与帝后丧礼等相关问题的辨析,认识特定政治集团、阶层与区域文化、制度文化、精神信仰、礼教环境等文化要素

的相互影响。秦府集团属于上层统治集团,处士阶层属于民间社会阶层,挽郎阶层处于上层统治集团与民间社会阶层之间,是倾向于上层的过渡阶层。在中古区域政治文化合流的主旋律中,集团阶层与相关文化要素相互作用表现有所不同。在上层,秦府集团是地域政治势力合理分配利益的产物,是上层实现政治文化合流的标志。民间社会阶层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在精神信仰方面,唐代处士阶层信仰状况表现为儒道并举佛教补充格局,是民间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挽郎参与帝后丧礼,接受了严格的政治礼教熏陶,这改变了他们的心智结构,挽郎特殊身份也深深影响着此阶层个体命运发展。

在围绕影响初唐政局演变的三件大事即唐高祖称臣突厥事、玄武门事变、唐太宗伐辽事,探讨了政治战略、政治目标、政治运作、政治势力、政治格局、关键人物等政治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隋末唐初,在东突厥推行胡人霸权的反历史潮流中,李渊集团执行扶杨隋反炀帝称臣突厥战略,迅速承继关陇集团轴心地位,为扭转历史潮流打下了雄厚基础。在统一进程中,伴随李渊集团势力的不断扩张,其内部李建成集团与李世民集团的权力之争日益激化,最终以喋血玄武门而告终。尽管李渊集团内部有父子相猜、兄弟相争、大臣相左等不和谐因素,但围绕统一、对峙突厥的历史趋势是李渊集团及其继任者李世民集团都遵循践行的主题,最终消除了政治文化合流的障碍。贞观后期,唐太宗为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通过讨伐高丽战争系统解决了威胁太子李治登基帝位的各种障碍,为大唐盛世的来临打下坚实的基业。

透过对政治人物李建成、李勣、尉迟敬德、杨恭仁、武则天、韦贵妃姊妹等相关史事探讨,重点挖掘了他们的才能、智慧、性